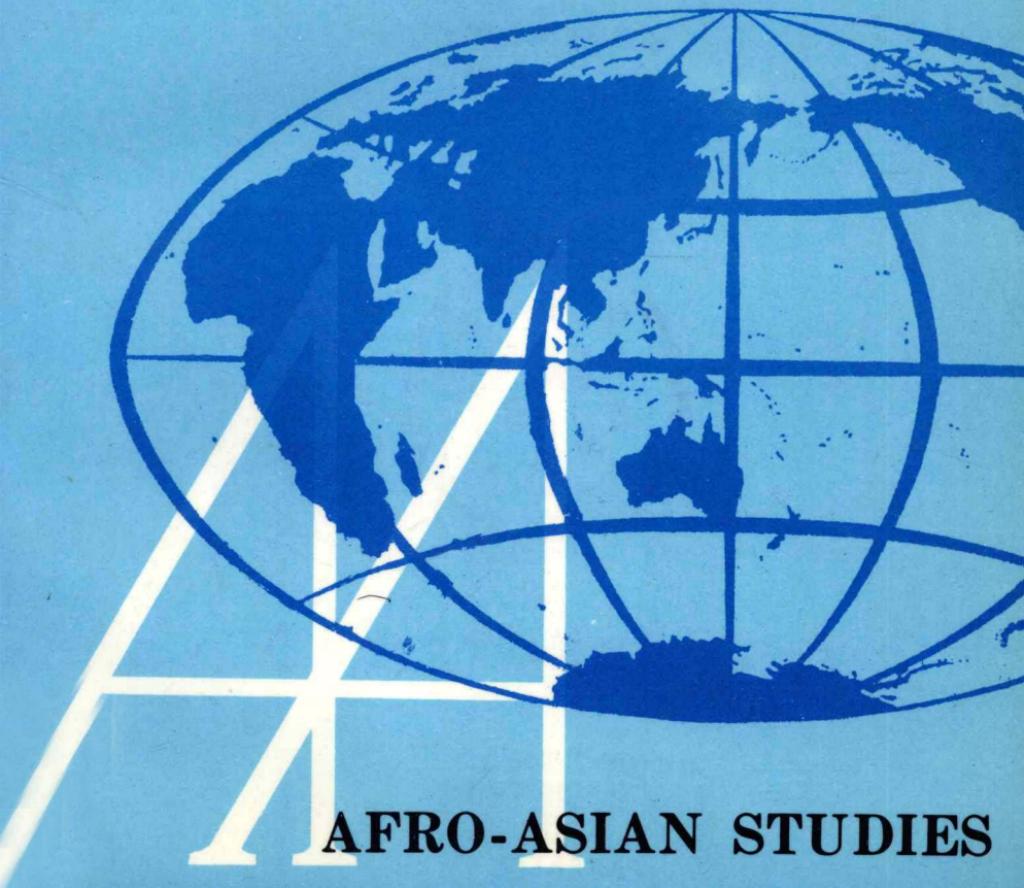


研究 | 亚非
6 |



AFRO-ASIAN STUDIES

亚 非 研 究

第 6 辑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书 名:亚非研究(第6辑)

著作责任者: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

责任编辑:马锐敏

标准书号:ISBN 7-301-03174-2/C·0116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印 刷 单 位:北京大学印刷加工部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00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一版 199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1,200 册

定 价:9.6 元

感谢卡乐 B(CALBEE)日本研究基金资助

《亚 非 研 究》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编 陆庭恩

副主编 梁英明 马锐敏(常务)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锐敏 安维华 陆庭恩

张振国 张敏秋 梁英明

樊建明

编　　辑　　说　　明

《亚非研究》为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主编的不定期综合性学术论文集，其前身为《亚非问题研究》（共出版12集）和《南亚东南亚评论》（共出版4辑），后者为原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主编的综合性学术论文集；1991年5月，两所合并，上述两种论文集亦随之停刊，并决定出版发行本论文集。

《亚非研究》主要刊登亚非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现状和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系统的资料，以及有关的外论选译，适当选登国内外有关的学术动态和重要的书刊评介等。阅读对象主要为外国问题的教学与科研人员以及外事工作者，同时也适合各级干部、知识青年和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阅读，以扩大国际知识的视野。

《亚非研究》是学术性研究文集，目的在于推动对亚非地区历史与现状的调查研究和开展学术交流，通过学术上的讨论，推动亚非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

《亚非研究》在编辑工作中坚持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在学术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各篇论文的观点只代表作者本人，而不代表任何方面。

《亚非研究》编辑部

目 录

东亚经济的发展与儒学的新使命	赵 靖(1)
亚太区域合作的新蓝图	
——大阪会议后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梁英明(13)
新保守主义与日本的政治改革	李寒梅(23)
日本的大学开放与终身教育	樊建明(42)
试论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护宪运动	李 玉(56)
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报刊述略	周南京(71)
越南南方阮氏割据政权与中国的关系	杨保筠(85)
冷战后南亚地区安全问题之管见	韩 华(114)
充分开发人力资源	
——印度第一大企业集团塔塔成功的原因之一	
.....	张敏秋(125)
中国人与印度教徒神明观的对比分析	尚会鹏(152)
孟加拉国阿扎姆事件的政治意义	林良光(172)
浅议中东国家的收入分配	安维华(186)
从卡萨布兰卡到安曼	
——逐步发展的中东经济合作	马志学(200)
阿拉伯与非洲经济关系的现状及其前景	陈建民(212)
海湾战争后伊拉克的国内政策	钱雪梅(227)
略论两次大战之间的埃及政党制度	陆庭恩(239)

- 新南非在前进 夏吉生(257)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李保平(272)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学术研讨会议论点综述 李保平(285)

Contents

-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Economy
and the New Mission of Confucianism Zhao Jing(1)
- A New Blueprint of Asia—Pacific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 *APEC after the Osaka Conference* Liang Yingming(13)
- Neo—Conservatism and Political Reforms
in Japan Li Hanmei(23)
- The Policy of Open University and Lifelong
Education in Japan Fan Jianming(42)
- On the First Movement of Defending Constitu—
tion in Japanese Modern History Li Yu(56)
-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News—
papers and Magazines in Indonesia Zhou Nanjing(71)
- The Relations of Nguyen's Separation Regime
in South Viet Nam with China in the
17—18th Centuries Yang Baoyun(85)
- A Superficial View on the Security Issue in
South Asian Region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 Han Hua(114)
- Developing the Human Resources to the Fullest
Extent

- One of the Ways to Success by the
Indian Biggest Business Group, Tata ... Zhang Minqiu(125)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Idea of
Deities in Chinese and Hindu Shang Huipeng(152)
-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Azam Incident
in Bangladesh Lin Liangguang(172)
-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Middle East Countries An Weihua(186)
- From Casablanca to Amman
-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Middle East
Countries Ma Zhixue(200)
-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
of Arab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and
Its Prospects Chen Jianmin(212)
- The Internal Policy of Iraq after the
Gulf War Qian Xuemei(227)
- An Elementary Study on Egypt'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Lu Ting'en(239)
- New South Africa in Progressing Xia Jisheng(257)
- The Influence of Reciprocal Causation on
the Policy of Aparthei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 Africa Li Baoping(272)
- A Summary of Main Theses in a Seminar
Held by the China Research Society for
African Affairs Li Baoping(285)

东亚经济的发展与儒学的新使命

赵 基

马克斯·韦伯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基督新教含有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的儒教缺乏这种精神，因此，中国难以像西欧那样进入现代经济发展的轨道。

这一论点曾为很多人所接受。在中国，过去也出现过一种看法，认为儒学思想同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要求是不相容的，有的人甚至把儒学看作是中国自十五六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展陷于长期停滞的原因。

本世纪60年代日本在经济上所创造的奇迹以及四小龙在经济上的起飞，使人们对儒学妨碍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论点日益产生了怀疑。上述国家和地区都是儒家文化的覆盖区，既然它们都能以当世最高的速度发展，怎能认定儒学只能是经济发展的枷锁和绊脚石呢？

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的经济也走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目前，正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起飞着。在中国大陆，儒学虽已不是支配思想，毕竟还是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而一国的经济发展是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响的。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二十一世纪将是太平洋国家的世纪，太平洋西岸将是全球经济上最富活力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和对待儒学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

题，必然成为世纪性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 从儒学中为现代化经济发展吸取营养

在儒家文化的覆盖区中能出现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儒家文化中包含着适合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潜质。必须使人们较为明确地认识到这种潜质及其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意义，才能自觉地把这种潜质充分开发出来，变成现代经济发展的营养，从而更有利于东亚经济迅速、健康的发展。

1. 以人为中心

儒学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形态，它不谈鬼神，不关心天堂、地狱和来世之类的问题，而只把人及其生存的现世，作为研究的中心。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①。当有人问他关于鬼神崇拜以及人死后有无灵魂和灵魂去向之类的问题时，他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② 孔子并不否定鬼神，只是认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现世，尽力于“知生”和“事人”，对现世了解得更充分，把现世的事情办得更好，而不必为鬼神之类缥缈难知的事情空耗心力。孔子不否定天道，但感兴趣的只是人道。孔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仁”，而“仁”归根到底就是对待人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所谓“仁者，人也。”^③ 如何对待人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了人，国家的一切工作，个人的一切努力，最终都是为了人的幸福，为了“安人”和“利人”；二是依靠人，解决人的问题，不靠赐予，更不靠祈祷或祝福，而是依靠和发挥人自身的主动

① 《论语·述而》。

② 《论语·先进》。

③ 《礼记·中庸》。

性来解决问题。孔子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①，提倡“无为而治”^②，就是此意。

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人终归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因素。从人类历史看，人的解放每前进一步，人受的束缚每减弱一步，经济的活力就越增强，经济就越能出现发展和增长。在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科技条件下，经济发展对人的素质、人的主动性的要求更高。儒家重视人的问题，把解决好人的问题看作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这种思想，在今天更成为一个值得开发的潜质；为了人的原则，可使经济发展有更明确的目的性；依靠人的原则，可使经济发展有更深厚的动力源泉，这对实现经济的更迅速、更健康的发展将有更重要的意义。

2. 以处理好人和人的关系为枢纽

儒家学说把处理好人和人的关系作为解决人的问题的枢纽。人和人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人伦关系和人群关系。人伦关系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儒家学说对人伦关系探讨、发挥较多，被称作“五常”，成了儒家所说的人和人关系的主要的、有特征性的内容。对人群关系，先秦时期荀况发挥较多。他把“人能群”即组成社会看作人异于禽兽的特点，认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者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③要组成群，必须处理好人群关系，包括个体同群体、群体同群体以及群内的个体同个体之间的关系，而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关键是“分”。所谓“分”，实际指的是权利、义务的界限。荀况说：“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④要把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使因争致乱，破坏群的稳定和存在，就必须对个体和群体、群体和群体以及群中的不同个体之

① 《论语·尧曰》。

② 《论语·卫灵公》。

③ 《荀子·王制篇》。

④ 同上。

间的权利与义务，约定一个“分”，使各安其分，才能使个体和群体都充分发挥作用，消除内耗，或使内耗尽量减小，以利于人的发展。

荀况对儒家人群关系的思想，阐述得是比较透彻的；不过，在后代的儒家学说中，人群关系远未得到像人伦关系那样的重视。

儒家和人关系的思想，对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孤立的个人无所谓发展经济的问题。他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牛、马谈不上发展经济，孤立的个人自然也谈不上。人能群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前提。既然人不能离群，就必须讲求怎样处理人和人关系的问题，而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就必须把握一个“分”字。人和人关系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分”的内容也随之而异，但必须处理好人和人的关系，必须保持群体的稳定，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时必须把握好一个“分”，这些原则，却无论何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人和人关系的一切方面变化快，旧的平衡容易被打破，新的平衡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社会容易出现“脱序”状态。这使及时调整、处理人和人关系的问题来得特别重要；否则，因争致乱的问题就会特别严重，特别难解决，群体稳定难以保持，经济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可靠的保证。

3. 以个人的事业心为动力

处理好人和人的关系必须有“分”作为约束，不使相互之间因争致乱。这只是从消极方面考虑人和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儒家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但人人都遵守“分”的约束，只能维持群的稳定，却不能促进群体的发展和进步。为了群体的发展和进步，还必须要求个体争为群体和其他个体做积极的贡献，这就是儒家所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②

① 《论语·颜渊》。

② 《论语·雍也》。

儒家不仅提倡个人为群、为他人做贡献，还要求人们树立这方面的事业心。这在中国传统的术语中，就叫做“立志”。人人立志就成为群的发展和前进的强大驱动力。

孔子教育学生，经常要他们立志，他对许多学生，都问及他们立志的情况：“盍各言尔志”^①。孔子不但提倡立志，还鼓励立大志，主张“士志于道”^②，“仁以为己任”^③。在春秋时代就有“三不朽”的说法，鼓励人在一生中应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或其一、二方面做出在历史上可以永垂不朽的贡献。三不朽之说，历来为儒家所称赏。儒家还主张，立大志不能是徒托空言，必须以长期不拔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志愿，《周易》宣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④《中庸》强调“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⑤《孟子》则主张：人为自己立定的大目标、追求的大事业奋斗，应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⑥当实现自己大目标的努力遇到严重的挫折和危险时，儒家主张应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乃至自己的生命，做到“杀身成仁”^⑦、“舍生取义”^⑧。

现代经济发展迅速，竞争激烈。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小利，或者安于现状，不求进取，都是同现代经济的本性不相容的。必须有强烈的进取心和事业心，并有为此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坚韧意志，才能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有为的角色。国家如此，个人也如此。儒家提倡的立大志，为实现宏远事业和目标毕生奋斗不息的精神，在同现代内容相结合的情况下，对培养适合于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

① 《论语·公冶长》。

② 《论语·里仁》。

③ 《论语·泰伯》。

④ 《周易·乾卦》。

⑤ 《礼记·中庸》。

⑥ 《孟子·滕文公下》。

⑦ 《论语·卫灵公》。

⑧ 《孟子·告子上》。

的人，是有重要意义的。

4. 以教育为基本管理手段

群体的事业，要靠群体的力量来完成。作为群体中的个人，一要遵守“分”的约束，不做损害群体的事；二要树立个人事业心并为之奋斗不息，努力为群体做出贡献。但是，这还不够，群体不是个体的机械的总和，每一个人做了自己的一份，并不能产生群体的协力。要产生群体的协力，还要善于联合和带动别人共同努力。对于处于某种领导地位的个人而言，尤其是这样。

联合和带动别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做法，例如强迫、利诱等都是。儒家也并不绝对地否定这些手段的作用。孔子既谈过“政”和“刑”在治国、治民中的作用，也谈到过以个人物质利益作为驱动力的问题，但他始终把教育看作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在儒家看来，强迫只能产生勉强的服从，而以物质利益驱动也只能带来个体对群体的一时的、有条件的致，只有通过教育使被领导者把群体的事业看作自己的事业，把领导者提出的管理目标看作自身的奋斗目标，才能有力地动员和团结广大群众，形成为实现管理目标而自觉奋斗的强大动力。《孟子》说的“善教得民心”^②，就是这个意思。

在教育方式方面，儒家最重视的是身教，即领导者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儒家认为：被领导不仅从领导者接受命令和指挥，还随时受着，而且是更多地受着领导者自身行动的影响。领导者在对被领导者发布命令、进行指挥时，必须自己首先不做违反命令和指挥所要求的事；否则，被领导者就不会相信你的命令和指挥的要求是

① 《论语·为政》。

② 《孟子·尽心上》。

认真的，就会消极服从，甚至阳奉阴违。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目标就难以充分实现了。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师以正，谁敢不正？”^①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②他还生动地把领导者对被领导者身教的作用，比作风和草的关系，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③

儒家的风行草偃论要求，领导者必须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能力，才能教育、带动群众共趋正确方向。不断完善自己是“修己”，带动别人是“安人”，合起来就叫做“修己以安人”^④。儒家学说千言万语，千头万绪，落实在行事上其实就是“修己以安人”这五个字，这也就是儒学所倡导的“内圣外王”功夫。

儒家这种以教育作为实现目标的主要管理手段的思想，对现代的经济发展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值得开发的积极因素。现代生产力、现代技术和现代经济的性质，对人的素质及人的主动性有很高要求，在此情况下，个人和群体目标之间的从思想到行动的一致性就特别重要。儒家以教育为主要管理手段的思想，虽然产生于二十五个世纪以前，但它在基本认识上，同现代行为主义之间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二)依据现代经济的性质和发展的要求改造儒学

儒学思想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适合于经济发展要求的潜质，在当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呈现空前活力的

① 《论语·颜渊》。

② 《论语·子路》。

③ 同①。

④ 《论语·宪问》。

时代，是弥足珍贵的。当然，在两千多年前产生，并且漫长时期中又是在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发展的儒学，不可避免地也包含着许多同现代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甚至相抵牾的内容。西方的基督教在资本主义的曙光时期到来时，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了宗教改革，把反映近代经济发展要求的精神吸收进去，改造和重新解释了基督教的某些教义，这就是马克斯·韦伯说的新教的资本主义精神。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长期陷于停滞，没能为儒学的改革提供必要的动力，所以在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以未经过改革的儒学面对近、现代经济发展这种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相互冲突的局面。今天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已为儒学的改革提供了动力，而且也迫切要求，对儒学适应现代经济的性质进行批判地继承和改造，开发其合乎科学的、适应现代经济要求的潜质，扬弃其落后的、反映落后历史条件的内容。这也就是常说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儒学思想中同现代经济发展要求最不适应、最相抵牾的内容主要是：

1. 以孝弟为政，以家道治国的主张

儒家讲内圣外王之学，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可以一以贯之。这种思想有正确的一面。因为儒家对这些层面都是从人、己关系的角度考虑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安人，修身或修己是安人的基础和前提）。但是，身、家、国、天下，毕竟是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运行、发展规律。如果只看到它们的一致面，看不到或抹煞其不同一面，就会处置失当，引起严重后果。

儒家认为治家和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一致的，因而就强调以孝弟之道为政，以治家之道治国。孔子引前人的话说：“‘孝乎惟孝，友